

李零 著

【增訂本】

郭店楚簡校讀記

郭店楚簡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但出土了戰國寫本的《老子》，還出土了多種記載孔子和孔門弟子言行的簡文，把我們和這兩大聖人的距離拉得很近。



【增訂本】

郭店楚簡校讀記

李零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李零著.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朗朗書房·李零作品)

ISBN 978-7-300-08426-8

I. 郭…

II. 李…

III. 竹簡文—研究—楚國(?)~前 223)

IV. K877.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28987 號



朗朗書房·李零作品

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

李零 著

出版發行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郵政編碼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關村大街 31 號		
電 話	發行熱線:010 - 88879833 編輯熱線:010 - 88879860		
網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書房網)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網)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網)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盛蘭兄弟印刷裝訂有限公司		
規 格	150 mm×229 mm 16 開本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張	20.25 插頁 2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數	179 000	定 價	28.00 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20世紀90年代，是簡帛古書大發現的時代，1993年于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郭店楚簡即當時的兩大發現之一。

《郭店楚簡校讀記》，是作者閱讀《郭店楚墓竹簡》一書的讀書筆記。作者在對竹簡釋文重新排比，重新考訂，多所訂正的基礎上，對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多所抉發，對道家、儒家研究提出了很多富于創建性的意見。他指出，這批簡文並不簡單就是子思學派的作品，也不能證明思孟之學獨得孔學真傳，從而在儒學界提出重新關注“七十子”的問題，對推進“七十子”研究、彌補思想史研究中的“漏洞”，具有巨大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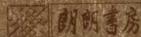
李零，生于1948年，祖籍山西武鄉縣，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期從事考古、古文字及簡帛古書的研究，曾先后參加美國賽克勒—弗利爾美術館藏戰國楚帛書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整理和研究。早在20世紀80年代，即著有簡帛古書研究專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其著頗豐，主要有《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孫子〉古本研究》、《吳孫子發微》、《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等。

朗朗書房·李零作品 出版主持 呼延華

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

李零文史論集



朗朗書房

long-long Book House

網址: www.longlongbook.com

發行熱線: 010-88879833

策 劃 / 吳興元

責任編輯 / 徐 剛 李二民 馬秀琴

版式設計 / 孟慶磊

封面設計 / 大象設計工作室 · 倪志強

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84603071

前　　言

悲憤出詩人，亂世見思想。

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中國是個“禮壞樂崩”的時代。^① 當時出了兩個著名的思想家，一個是老子，一個是孔子。他們的後學對他們做了很多解釋，也留下很多疑惑，成為咱們反覆認識的傳統。郭店楚簡的重要性在於，它不但出土了戰國寫本的《老子》，還出土了多種記載孔子和孔門弟子言行的簡文，把我們和這兩大聖人的距離拉得很近。如果我們把古書比作一條藏在雲端的龍，宋元以來的古書是它的尾巴，敦煌的發現是它的身子，那麼，現在的發現就是它的脖子，我們離看到龍頭的日子已不太遠了。

過去，老實說，我一直對孔子提不起興趣，覺得論深刻機智，他比不上老子。可是現在，九十年代，郭店楚簡，上博楚簡，出土

^① “禮壞樂崩”，見《漢書·藝文志》和《漢書·劉歆傳》引漢武帝詔書，語出《論語·陽貨》“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今俗語多作“禮崩樂壞”。

最多的卻是大量儒書，它們逼我重新閱讀，重新思考，改變偏食的習慣，讓我學到很多新知識。特別是它提醒了我，向來的思想史研究，其實有個很大的漏洞，就是近代以來，我們對孔門學案最早的一段，即所謂“七十子”，太不重視，認為《禮記》是漢代文獻，《論語》以外，免談孔子，老是用“孔—孟—荀”三段式講早期儒家，把本來最重要的一段給忽略掉了。^①

研究早期儒學的傳承，即使今天，我們也還得讀《史記》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② 從前，我總納悶，孔子當年，既無班級編制，又無課堂講授，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或七十七），他教得過來嗎？後來我才知道，古代的教學制度和今天不一樣，當時的老師，他們的學生是由三部分人構成。一種是登堂入室，親炙師教者，是所謂“受業”、“及門”、“入室”的弟子。一種是登記在冊，不一定能見到老師，而由前者輾轉傳授，則是所謂“編牒”、“著錄”、“在籍”的弟子。還有一些，祇是“仰慕虛名、借資聲氣”的熱心追隨者，除了“大會都講”，站在遠處觀望，一睹大師丰采，其實學不到什麼。^③ 所謂“仲尼弟子”，當是包括了這一大堆學生。比如，以東漢的情況而論，據呂思勉先生講，當時的大師，

① 李零《道家與中國古代的“現代化”》，收入《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299—311頁；《從簡帛發現看古書的體例和分類》，《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年第1期，25—34頁。

② 鄭玄《孔子弟子目錄》佚文，《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以及《孔叢子》等書，也是重要參考。

③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劄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上冊，675—678頁：“講學者不親授”條。

他們的第一種學生都是動以千計，第二種學生也在萬人以上。^①西漢和西漢以前，情況還沒這麼熱鬧，但以古代的制度考慮，孔子有七十多個學生和三千多名追隨者，倒也並非不可想象。^②

在《仲尼弟子列傳》中，孔子的學生，見於《論語》等書，可以考見其年齡、姓名和受業情況，祇有三十五人，還不到一半。他們當中最出名，是以“德行”著稱的顏回（子淵）、閔損（子騫）、冉耕（伯牛）、冉雍（仲弓），以“政事”著稱的冉求（子有）、仲由（子路），以“言語”著稱的宰予（子我）、端木賜（子貢），以“文學”著稱的言偃（子遊）、卜商（子夏），即所謂“四科十哲”。但這些弟子，他們好像都沒有著作傳世。相反，名氣小一點的其他二十五人，他們中的某些人，後來倒是自立門派，有不少追隨者，也有著作傳世，如顓孫師（子張），後世有“子張之儒”；曾參（子輿），司馬遷說曾參作《孝經》，《漢誌》有《曾子》；宓不齊（子賤），《漢誌》有《宓

^①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劄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上冊，675—678頁：“講學者不親授”條。

^② 孔子的在籍弟子（或受業弟子）到底有多少，司馬遷兼載異說，一種是“七十七人”說，見《仲尼弟子列傳》。他寫此傳，參考過一本書，就是講孔門師承的《弟子籍》。這本書是出自孔壁的戰國寫本，當是孔門原來的說法（《孔子家語》的記載也是七十七人，但卻以“七十二弟子解”題篇）。他是根據這個花名冊，再加上《論語》的有關記述，然後寫成此傳。在這篇列傳中，他一上來就說“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注意：它是以“七十有七人”為受業弟子），估計就是出自《弟子籍》。另一種是“七十二人”說，則見《孔子世家》。《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注意：它是以“七十有二人”為身通六藝者）。這種說法也有較早的來源。如漢景帝時，蜀郡太守文翁刻過一套《文翁禮殿圖》（即以此為主題的很多漢畫像石所本），上面的弟子就是七十二人（“七十二”是湊“五行之數”）。此外，《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孔子徒人圖法》，以及後來的《孔子家語》，它們也都記載了這批弟子。

子》；漆雕啓（子開），^①後世有“漆雕氏之儒”，《漢誌》有《漆雕子》。另外，不在這批弟子當中，但活動時間相近，還有孔子的後代孔伋（子思），後世有“子思之儒”，司馬遷說子思作《中庸》，《漢誌》有《子思子》。戰國晚期的“儒家八派”（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就是從“七十子”發展而來。^②

研究“七十子”，過去可以利用的資源，除去《論語》，主要是漢人傳授的大小戴記（即《大戴禮》和《禮記》）。這批“記”的來源是孔壁《古文記》。它們的內容很不一樣（劉向《別錄》把《禮記》分成十類），其中有不少講禮儀制度的篇章（屬劉向分類的“制度”、“明堂陰陽記”、“世子法”、“子法”、“喪服”、“祭祀”、“吉禮”、“吉事”八類），所以曾被當作解釋“禮經”（即《儀禮》）的參考資料，稱為“禮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批文獻中，還有不少篇章是記孔子之言，或孔子與七十子的問答，或七十子本身的著作（主要集中於劉向分類的“通論”、“樂記”兩類，但其他幾類也

① “啓”，漢代避諱作“開”。

② “子張之儒”、“子思之儒”，無疑義。“孟氏之儒”是孟子的學派，“漆雕氏之儒”是漆雕啓的學派，“孫氏之儒”是荀子的學派，也不成問題。“仲良氏之儒”是仲梁子的學派，“樂正氏之儒”是樂正子春的學派。樂正子春是曾子的學生，仲梁子可能也是，他們都是傳曾子之學，這點也還算清楚。唯“顏氏之儒”，多以為是顏回的學派，則有疑問。案孔門弟子以“顏”為氏者有九，未必即顏回。又據上博楚簡，言遊之“言”與顏回之“顏”無別，它也可能是言遊的學派。我們從古書引用的情況看，戰國中晚期，儒家的主要派別可能是子張、曾子、子思、言遊、漆雕啓，以及孟子、荀子的學派。儒家八派無子夏，是一大疑問。

有相關內容)，與《論語》相似而篇幅較長。比如曾子和子思的作品，就是賴此以傳，保存到現在。

在前人的研究中，通過發掘“七十子”，重建所謂儒家“道統”，最有名的是晚近影響很大的宋明理學。他們的開掘資源主要就是大小戴記。如宋楊簡輯《先聖大訓》，薛據輯《孔子集語》，汪晫輯《曾子》、《子思子》，^①以及朱熹收入《四書》的《大學》、《中庸》（他認為《大學》是曾子的作品，《中庸》是子思的作品），它們的來源主要就是這兩本書。^②近年來，有些學者重新收集《論語》以外的孔子言論或有關記述，重新整理孔門弟子的有關資料，^③仍然未能脫其範圍。

所以，不可避免的是，現在研究孔子和他的第一批學生，宋學還是入手處。

當然，現在研究“七十子”，我們又有不少新資料，宋人看不到。這就是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

在郭店楚簡的十八篇中，我們讀到的絕大部分作品都沒有“說話人”。唯一有“說話人”的，是《緇衣》和《魯穆公問子思》。

^① 楊簡(1141—1226年)，見《宋史·道學傳》，學出陸九淵。薛據（“據”或作“璇”），是楊簡的學生薛疑之（“疑”或作“凝”）的兒子，疑之以學授其子。汪晫(1162—1237年)，與朱熹同時。他們的書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輯本，而是一種帶有新編性質的主題摘錄本。

^② 宋人認為，孔子之學的嫡傳是顏回、曾子、子思、孟子（見朱熹《大學章句序》、《中庸章句序》），但顏回無書，有書者祇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他們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書”，就是體現這種“道統”。

^③ 如李培謙等《孔子資料彙編》和《孔子弟子資料彙編》，山東友誼書社，1991年。

前者有“孔子”，後者有“子思”（該篇中的“成孫弋”，我們還不清楚是什麼人）。學者認為，這批竹簡主要是子思本人或子思學派的作品。這種說法對不對，或者哪些篇是，哪些篇不是，這個問題還可討論，但它們反映的主要は“七十子”的東西，或“七十子”時期的東西，其中也包含子思一派的東西，我完全同意。

在數量更大，現在還沒公佈的上博楚簡中，我們也發現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中的人物，如顏回、仲弓、子路、子貢、子遊、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們的名字題篇。它們是“七十子”的東西，這點更明顯。

另外，這兩批竹簡，它們都有與今大小戴記相同的篇章，如上博楚簡的《武王踐祚》和《內禮》，見於《大戴禮》（前者是據《大戴禮》題篇，後者有自己的題名，但相當《大戴禮》的《曾子立孝》）；《孔子閒居》和《緇衣》，則見於《禮記》（都是據《禮記》題篇）。郭店楚簡也有類似的《緇衣》篇。

總之，如果我們不再疑神疑鬼，我們應該相信，我們碰上的正是“七十子”或與“七十子”有關的作品。這是我們的福氣。

讀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我們不難發現，它們不但有與《論語》相似的辭句，而且和大小戴記也有密切關係。學者的大量考證可以證明這一點。所以，談到對郭店楚簡的印象，很多人都認

爲，現在的發現證實，宋明理學才找到了儒家的本源。^① 對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有點不同。

第一，我認爲，孔子的一生有多面性，他既有道德追求，也有事功考慮。過去，大家對他有一些固定印象，比如說，他不講“怪力亂神”，也罕言“天道性命”（和道家愛談宇宙論和養生問題形成對比），興趣更多是在仁義道德和禮樂制度。他更關心現實問題、世俗問題，而不是宗教問題、哲學問題，這不能說是虛構。但他的思想還是包含了多種發展的可能。^② 他的後學，出身背景不同，性格志趣各異，本身也有各自的選擇。不但“七十子”和他們的老師不一樣，而且“七十子”之間，“七十子”與“儒家八派”，他們也不一樣。很多問題是，老師不講學生講；或老師語焉不詳，學生大肆發揮。宋儒以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建立道統，強調其心性之學，強調其道德修養，這當然有重要意義，甚至可以說是重要發現，但這祇能說是發現了早期儒家的一個側面，或一條線索，而不是它的全部，更不是它的主流。我相信，一個兩千多年被人反復解釋的孔子，不可能是一個有固定面貌的孔子。

^① 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郭店楚簡與儒家經籍》、《荆門郭店楚簡中的〈子思子〉》，收入姜廣輝主編《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13—17, 18—21, 75—80頁。又 Li Xueqin, “The Confucian Texts from Guodian Tomb Number One: Their Date and Significance,” *The Guodian Laozi*, edited by Sarah Allan and Crispin Williams,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0, pp. 107—111. 姜廣輝《郭店楚簡與〈子思子〉》，收入姜廣輝主編《郭店楚簡研究》，81—92頁；《郭店楚簡與道統攸繫》，收入姜廣輝主編《郭店簡與儒學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一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3—40頁。

^② 比如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就涉及心性問題。

第二，戰國秦漢的儒學是以政治關懷為中心，這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側面。雖然孔子當年，他在政治上不太得意，所以對講求德行的弟子更偏愛，但孔子死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記·儒林列傳》），他的學生，真正得志的反而是長於言語、政事和文學者。當時，“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同上），他的很多學生，還有學生的學生，其實都很趨時趨勢，與政治潮流有密切合作。比如子夏對三晉地區的法術傳統（這個傳統後來被商鞅傳播到秦國），還有好談制度、傳帝王術給韓非、李斯的荀卿，就有很大影響。戰國晚期，流行刑名法術和陰陽五行，儒家與這類學術對話（利用儒家典籍中的親緣成分），也主要是制度派，而不是道德派。他們的所作所為，雖未必合於孔子本人的理想，但卻是戰國秦漢儒學發展的主流。當時，顏回一流的人物，祇能“隱而不見”（同上），人數很少，而且吃不開。

第三，宋儒的建立道統，是逆反原來的主流，重張孔子思想被掩蓋的部分，變支流為主流，情況正如漢初道家從刑名法術重返清靜無為。戰國秦漢，儒家講制度太多，在宗教、哲學問題面前，本來就捉襟見肘；而魏晉隋唐，又遇釋道挑戰，在這些精致的思想體系面前，也難免相形見绌。這是宋代學術發生重大轉機的歷史背景。但他們的“復古”，與其說是“復古”，不如說是“託古”。他們真正復原的恐怕還是他們心中的古代，而不是本來的古代。比如現在，以郭店楚簡為例，我們碰到的情況好像是，儒家本來關心的就是天道和心性，而且對超越性的問題也饒有興趣。這對不對呢？似乎比較對。但我們不要忘記，郭店是局部，

而不是全體，在上博楚簡中，早期儒家的面貌要比這複雜得多。更何況，我們就是把上博楚簡加上去，它反映的也還是局部。我們應當看到，儒家在漢代之所以躍居主流，孔子之所以被歷代尊崇，關鍵並不在於它對現行制度的批判和抗辯，^①也不在於它對社會苦難的悲憫和同情，而是在於它與制度的結合，特別是與文官政治和仕途經濟的結合。它對“天”的關心，主要還是作為政治命運的關心；它對“人”的關心，也主要是作為政治動物的關心。

總之，當我們為郭店楚簡的發現而歡呼雀躍時，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研究僅祇是管窺蠡測。

2001年10月11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① 秦漢之際的制度創設，每一步都伴有儒家的反動。秦始皇統一天下，本來是想三統一：統一制度，統一宗教，統一學術，一步到位。但他做到的祇是一條半，即車書一統和二百祠畤。他請儒生、方士興太平，雙方鬧翻，統一學術宣告失敗。這是第一步。後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還是統一學術；巡狩封禪，興立祠畤，還是統一宗教，仍然是做秦始皇沒有完成的事。但他完成的祇是學術統一，宗教統一，遭王莽反對，被打折扣。東漢以來，宗教失控，乃有民間借術立教的高潮，終於導致道教的興起和佛教的引入。

凡例

(一)本書所收郭店楚簡釋文是據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一書,但對原書釋文有許多改動。

(二)原書是以《老子》甲、乙、丙三組、《太一生水》、《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語叢四》為序排列簡本各篇,今依字體、形制重新排序(參看後面附錄的《郭店楚簡的字體和形制》),並對部分篇題加以修改,提出新的命名(但校讀記、補註和餘論中的篇名仍用舊名,以便查對原書)。

(三)原書釋文是比較嚴格的釋文,祇對若干字的釋讀有所省并(其寬嚴尺度不盡統一),本書釋文則按傳世古書的閱讀習慣(東漢以來的閱讀習慣),直接按讀法轉寫古體、異體和通假字(傳世古書皆經此類轉寫),以便通讀文義。

(四)簡文原有篇號(劃分篇的標記,作鈎形)、章號(劃分段落的標記,作墨釘或粗短橫,有時也以句讀式符號代之)、句讀(多數是起句號或分號的功能,少數是起逗號或頓號的功能,作

短橫、短撇或小點)和重文、合文號(前者表示字的重複，後者用於借筆省形、縮兩字為一字的情況，兩者形式相同，作兩短橫或一短橫)。這些符號對理解簡文結構極為重要。原書釋文對前兩種符號或標或不標(標注者祇限符號後接抄其他簡文的地方)，後兩種符號概加省略，今將前兩種符號一律補齊，篇號統一作「」；章號，以■表示墨釘，—表示粗短橫，|表示句讀式章號，後兩種符號仍然略去(如與前者混淆，則在校讀記中加以說明)。凡篇號、章號後有空白，今以“—”號表示空字，一個符號代表空一字。

(五)簡文殘字，可據文義補釋者，原書外加方框，今略去；缺字，可據文義補釋者，原書是以註釋說明，今則加於釋文(祇是為了幫助理解，未必符合原貌)，括以□號。

(六)簡文衍文，一概刪去；錯字則直接改正，不再用()號括註；脫字，可據文義補釋者，原書是以註釋說明，今則加於釋文，括以【】號。

(七)簡文中字形結構不明的字均保留原形，讀法不明的字也保留原字，闕疑待考。

(八)原書不分章節，祇將銜接情況相對明確的簡文分組排列(下文簡稱為“拼聯組”)，中間空行，今據原簡的篇章符號，參酌文義，略分章節，并對原書的拼聯和排列有所調整。但簡文無論是否經過調整，原來的簡號均保持不變(以便核對原書)。其中凡可連讀者不再空行，不能連讀或排列順序有較大伸縮餘地者則仍然空行。前者依次標註章號(作1、2、3、4……)，後者則分組標註章號(作1：1、1：2……，2：1、2：2……，等等)。

(九)本書除分章分組的釋文，還附有校讀記。凡採納原書釋讀（無論是整理者的意見還是審校者的意見），不再重複說明，說明僅限本書與原書理解不同的地方。校讀記中的引書多用簡稱，如“馬甲本”指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收入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馬乙本”指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也收入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王弼本”指王弼《老子道德經註》，“釋文”、“註釋”指《郭店楚墓竹簡》的釋文和註釋，“裘案”指《郭店楚墓竹簡》一書註釋所附裘錫圭先生的案語，“裘釋”指裘錫圭《以郭店〈老子〉簡為例談談古文字考釋（資料摘要）》（郭店《老子》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Dartmouth College，1998年5月22—26日。現在正式發表，題目作《以郭店〈老子〉為例談談古文字》，收入姜廣輝編《郭店簡與儒學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一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80—188頁）。其他出處則僅括註篇名，讀者欲知詳細的出版情況，請看書後的“引用書目”。

(一〇)本書祇是用來輔助閱讀原書，而並不是用來代替原書。讀者如欲核對簡文，務請查閱原書。

(一一)本書是在舊作《郭店楚簡校讀記》（陳鼓應編《“郭店楚簡”專號》，即《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455—542頁）的基礎上擴大改寫，現在有許多細節上的修訂，故本書增加“補註”，以說明作者的修訂理由和補充意見。

(一二)舊作《郭店楚簡校讀記》主要是討論簡文的釋讀，而很少涉及簡文內容的理解，現在增加的“餘論”，則補充了這方面的討論，並對存在爭議或值得開掘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